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日本江戶時期的蘭學

doi:10.6796/HM.200303.0004

歷史月刊, (181), 2003

Historical Monthly, (181), 2003

作者/Author： 闕文三

頁數/Page： 48-5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96/HM.200303.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專輯】 ● 闕文三

日本江戶時期的蘭學

日本的荷蘭商館

公元一六〇〇年，一艘荷蘭貿易公司的船舶漂流到日本海岸，開啟了日本與荷蘭交流的新時代。在江戶時期（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年）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下，荷蘭東印度公司得到特許，獲准與日本進行貿易，並設立商館。透過荷蘭作為橋樑，西洋學術（「蘭學」）開始有系統的傳播到日本。蘭學的興起與發展，使封閉的日本順利進行轉型，走向近代化之路。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期間，其經濟社會體系主要以所謂的美國模式為學習對象，融合日本原有風土文化，發展出日本特有的生產體系與運作方式。

但近年來日本警覺到舊有模式已逐漸喪失活力，無法適應今日全球化的演進，甚至將過去十年稱為「遺失掉的十年」。因此一向善於檢討改進的日本人努力尋找新的

學習對象，結果一些學者發現三、四百年

前曾是日本西方文化啓蒙導師的荷蘭，在二十一世紀可能再度成為日本學習的榜樣。原來在江戶時期（一六〇三～一八六年）荷蘭會大力地教導日本學習西歐文明，為後來的明治維新打下了基石。且讓我們花點時間，回顧當初日本透過荷蘭，積極吸取西歐文明的歷史過程，以及當時不可或缺的荷蘭語翻譯人員，即所謂的「阿蘭陀通詞」，在其間所扮演的角色。

荷蘭東印度公司，批准該公司在平戶設立分公司，即荷蘭商館，與日本進行貿易。江戶時代日本幕府為了完全杜絕基督教舊教進入日本，而施行「鎖國」政策，即閉關自守政策（一六三九～一八五四年）。當時新教國家荷蘭由於只對進行貿易有興趣，而不熱衷於傳教布道，因此西方國家中只有荷蘭船隻獲准航渡日本。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和日本進行貿易，於一六二四年在

透過荷蘭語傳達到日本，所以日本人將之稱為「蘭學」。一六〇〇年四月十九日，荷蘭鹿特丹貿易公司所擁有的三百噸帆船慈愛號漂流到日本豐後海岸（為現今日本大分縣臼杵市佐志生）。啟航時載有一百一十名船員，漂流到日本時只剩下二十四名，上岸後不久又陸續有六人死亡。結果該船船長威廉·亞當斯被德川家康延攬，改名三浦按針，負責江戶幕府對外交涉工作。一六〇九年德川家康授「朱印狀」予荷蘭東印度公司，批准該公司在平戶設立分公司，即荷蘭商館，與日本進行貿易。





漂流到日本的威廉·亞當斯（前右），後來受到日本統治者的重用。

荷蘭國旗的地方。 荷蘭貿易船隻定期於每年夏天駛抵長崎港。

這些由歐亞各地航行來的船隻在入港時都必須提交以下四種文件，即所謂荷蘭傳聞書、搭乘者名冊、貨物目錄和書信類。幕府即透過荷蘭傳聞書掌握世界局勢，作為制訂對外策略的研判資料；搭乘者名冊則能掌握住在台灣安平建築城堡作為中國生絲等商品運往日本的基地。一六四一年依照幕府指示，將原設立在平戶的荷蘭商館遷移到長崎港的人工島——「出島」上，以便幕府監管。荷蘭商館每年支付幕府銀兩五十五貫（合目前日幣將近一億元）作為租金，荷蘭即經由貿易積極地將西歐文物陸續介紹到日本。被隔離在這只有四千坪左右的扇形島內，荷蘭人慨歎無異被關在「國立監獄」裡，但也因為這種嚴格管制，使得荷蘭商館不受外界干擾或捲入戰禍中；並且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當荷蘭淪為法國統治下，各處殖民地落入英國手中時，日本荷蘭商館成為全球唯一仍懸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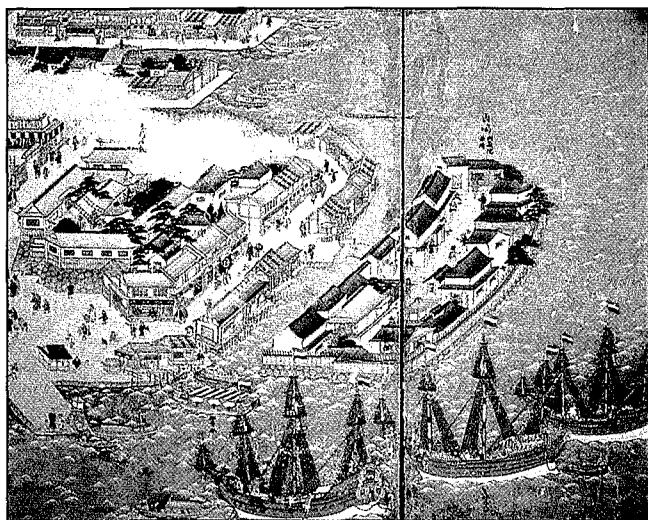
事實上在閉關自守政策實施之前，西歐學術已經經由耶穌會教士傳到日本，但其內容層次比較低，傳授上也缺乏系統，僅居於附屬地位，用來補充已在日本生根的中國學術。當時日本人受中文影響，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為「南蠻人」，其學術為「南蠻流」。蘭學一開始也只是片段的口授相傳，當時稱為「阿蘭陀流」或「紅毛流」。但在學習過程中日本人發現

西方學術和東方學術本質不同，後來更認為西方科學凌駕東方學術而開始積極地吸取。由於當時幕府不容許基督教在日本傳教，排除西方形而上學或人文科學，只容許自然科學技術的傳授，故蘭學在內容上以醫學、天文曆法、地理、兵學為主。傳承上，荷蘭方面以商館的醫師為主，還有商館館長、書記等人士也參與其事；日本方面除了獲得幕府特別許可的一些有志之士之外，自然以幕府派駐商館的翻譯人員為中心。

鎖國政策實施前，外國傳教士和貿易商得自由地在日本與一般平民百姓接觸，也多能獲得學習日語的機會，以便進行傳教和貿易活動；相對地，跟隨傳教士信奉基督教的日本人也得以進入神學院或修道院學習葡萄牙語或拉丁語，其中不乏成為葡萄牙語翻譯人員，當時這些人稱為「南蠻通詞」。但在鎖國政策實施後，為了杜絕宗教活動和地下貿易，規定荷蘭商館館長人選必須每年更迭，館內工作人員也不得長期駐任，活動範圍更被侷限在出島內，因此難得有機會和一般日本百姓接觸，更遑論學習日語。宗教活動既被禁止，原本提供日本人學習歐洲語言的神學院等自然也不得繼續存在。在此情況下，幕府只得公開招募或者着手培訓荷蘭語翻譯

人員並且予以組織派用。

荷蘭語翻譯人員



長崎的出島。

當時日本荷蘭語翻譯人員稱爲「阿蘭陀通詞」，前後人數估計超過一萬人。位階和人數由上至下大致爲阿蘭陀通詞目附兩名、大通詞四名、小通詞四名、稽古通詞若干名、內通詞小頭十二名及內通詞近百名。前四種位階屬正規翻譯官，內通詞小頭和內通詞則在翻譯官的指令下工作。翻譯人員基本職務爲：

一、學習語言：基本上除了荷蘭語

外，依狀況需要學習其他語言如拉丁語等。

- 二、臨檢入港船隻：主要分辨入港船隻是否爲獲得通商許可的荷蘭船隻。
- 三、翻譯荷蘭傳聞書：爲閉關自守政策下的幕府獲得海外訊息的唯一重要管道；翻譯人員將其譯成日文，呈報幕府。
- 四、翻譯搭乘者名冊：包括國籍、姓名等。

五、翻譯貨物目錄：主要爲了查察是否有幕府規定的違禁品。

六、貿易業務：負責從船隻入港到出港期間的所有繁雜貿易業務。

七、照料荷蘭人：荷蘭商館駐在人員和停泊船員的有關日常生活一切照料，包括外出管控、種種聯絡手續等雜務。

八、值班：輪流在翻譯官會館和宿舍值班，並負責記帳、作帳，保管文件、用具等。

另外兼任的職務有：

一、年度輪值翻譯官：由大小通詞各一人輪流擔任。主要負責長崎市府與荷蘭商館之間的聯絡交涉事務、荷蘭人晉謁江戶幕府時的有關手續安排、對荷蘭人的種種管理與監視，以及日本人到出島考察或與荷蘭人交流、下訂單時的安排等大小事務，當然還有記下每天工作內容的所謂《萬記帳》日誌。

二、江戶輪值翻譯官：荷蘭商館館長等一行晉謁江戶幕府時的隨行翻譯官，也是由大小通詞各一人輪流擔任。負責期間一切大小事務的聯絡交涉以及晉見時和訪客到來時的所有翻譯工作。

三、御用翻譯官：負責爲幕府將軍、大臣、長崎市府以及長崎長老們向商館下訂單、檢視舶來品、評定價格等。

上述江戶輪值翻譯官的設置，是由於一六三三年起商館館長等一行人得以定期晉謁幕府。對長年活動範圍被限制在出島上的商館館長和隨員來說，江戶晉謁給了他們走出出島，沿途直接接觸日本人、了解日本的一個機會；而日本平民百姓也得以目睹與接觸歐洲人。另一方面，原以商館所在地的長崎爲中心的蘭學也因此得以逐漸擴展到幕府所在的江戶，即今日的東京地區。因爲在晉謁期間總有許多幕府人士或各地藩屬醫師、天文學者經常訪問荷蘭館長，聽取有關西方情勢，或會見商館醫師請教研習上的諸多問題。在這些諮詢答問中，在在需要翻譯官居間協助。當時位居幕府將軍顧問要職的朱子學者新井白石（任職時間一七〇九至一七一六年）就經常在荷蘭商館晉謁時透過翻譯官向荷蘭人詢問許多問題，內容包括荷蘭國情、地理、宗教等，爾後乃留下了《和蘭記事》、《阿蘭陀考》名著。另外出版的



新井白石及其著作《西洋紀聞》。



《西洋紀聞》和《采覽異言》則是他在對企圖潛入日本傳教的義大利傳教士席多戚進行了四天的盤問後，將有關西方世界的盤問內容彙整出來的著作。整個盤問過程中，自然也有翻譯官員的參與，但由於席多戚不懂荷蘭語，這些翻譯官還接受了由荷蘭人教授的拉丁語密

集訓練。

隨後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攝政，推行所謂「享保改革」，為了發展振興產業而積極獎勵西歐科學，自然其對西洋學術的關心主要為實用主義。如為了增加稅收獎勵農民生產米麥以外的各種作物、藥草等，教導農民農學、本草學，使當時透過翻譯的植物學、

藥物學獲得顯著進展，連帶與農業生產有直接關係的天文曆法也有了長足進步。他於一七二〇年放寬原本為了杜絕基督教教義而頒布的「禁書令」，允許輸入與宗教無關的漢譯西歐科學書籍，如《曆算全書》、《曆象考成》等，使西歐天文曆算知識得以順利進入日本。為了製造渾天儀、測午儀改編曆法，更於一七三六年要求荷蘭商館館長從荷蘭派遣曆法專家航渡日本。另外爲了改良馬匹，從一七一五年到一七三七年間，透過荷蘭商館前後輸入了三十四波斯種馬。在這期間，也陸續招聘了科伊斯爾（Hans Jürgen Keiser）、科里·德·曼

（Godfried Kriedeman）、威爾內爾（Jan Jephart Werner）等三位馬術師到幕府傳授馭馬術與療馬技術。當時高等翻譯官今村源右衛門英生將充滿獸醫學專業術語的荷蘭語原文書《馬療書》和《藥方書》翻譯成日文，加上科伊斯爾所教授的療馬技術，集結成書，取名爲《西說伯樂必攜》。

蘭學的興衰

一七四〇年將軍下令幕府儒學者青木昆陽和紀州藩醫師野呂元丈學習荷蘭語，後來青木氏著作了《和蘭文字略考》。其門下前野良澤原爲醫師，就依據這本書和同爲醫師的杉田玄白、中川淳庵等人翻譯了人體解剖書籍《解體新書》，於一七七四年八月出版。這三人在一七七一年三月四日，實際見識了在江戶千住刑場進行的屍體解剖，發現由德文原著翻成荷語的解剖學書『Ontleedkundige Tafelen』（Amsterdam, 1734——原作者Johann Adam Kulmus）裡的精細插圖和實際人體內臟絲毫不差，對西歐醫學留下深刻印象而決意翻譯這本書籍。這本日文取名《解體新書》的解剖書說明了西洋醫學的一實證



前野良澤自畫像。

科學的事實與其優越性；當時在日本不僅是醫學界劃時代的著作，更推動了學習西歐學術的風潮。但它已不再是口授眼傳模彷式的片段學習，而是一種經由荷文書籍，有組織系統的研究。杉田氏也開始正式稱這種學術為「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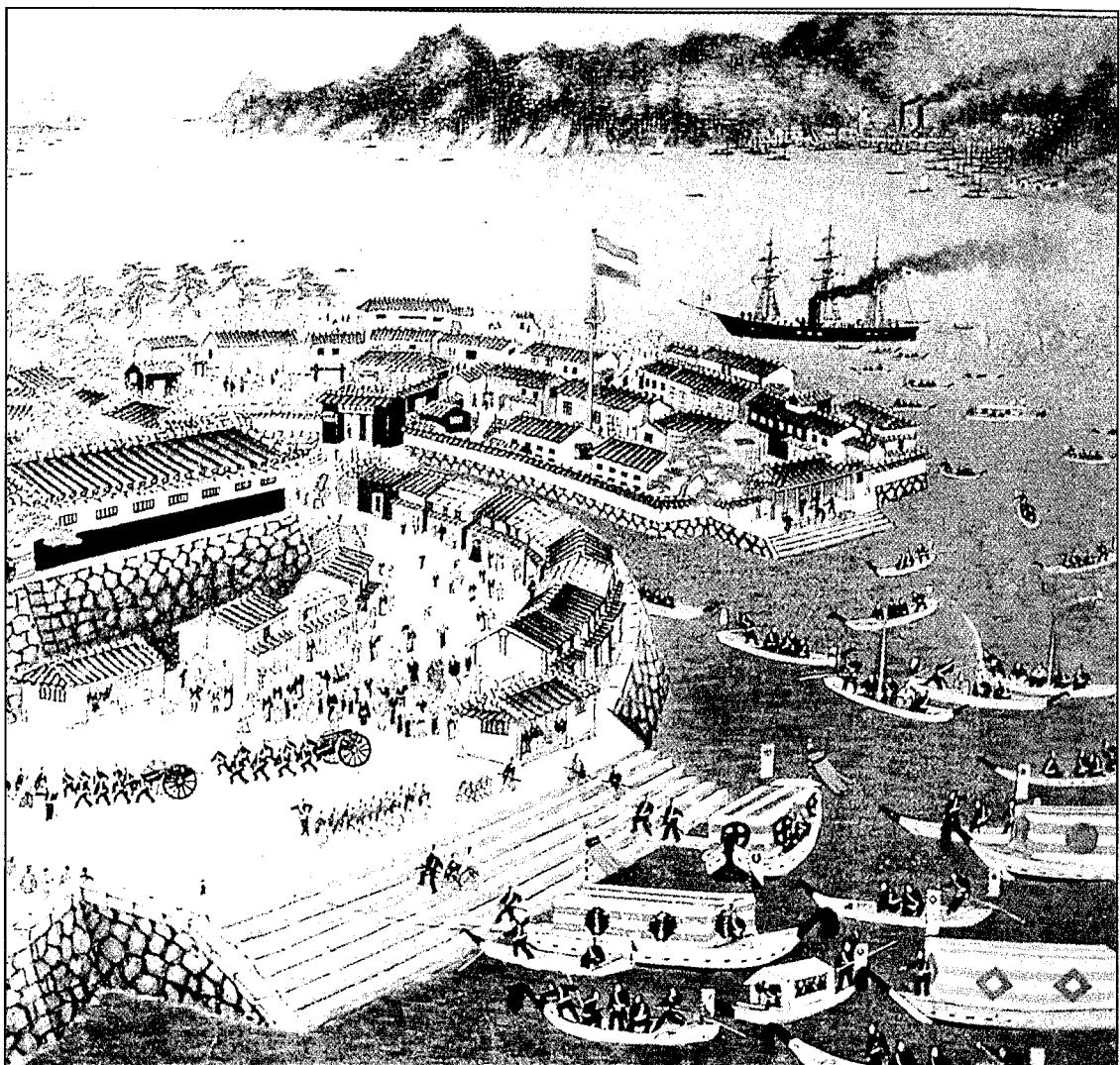
在蘭學的啟蒙教育上，最具意義的著作不外杉田氏的門下大槻玄澤於一七八八年發刊的《蘭學階梯》一書了。該書上卷說明蘭學的背景與歷史，下卷則從文學、訓詁、語法等解說荷文，是第一本較有系統地解說荷語文法的入門教科書。大槻氏的門下稻村三伯等人則根據法蘭斯瓦·哈爾馬（Francois Halma）編著的荷法字典《蘭佛對譯辭典》編纂成《波留麻和解》（意即文解說哈氏字典）。還有當時的荷

蘭館長道甫所編纂的《蘭和辭書》，都對蘭學的研究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大槻氏更藉著開班授徒將蘭學推展成全國性的學術。一七八六年開辦的私塾「芝蘭堂」於四十一年間培育出上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門生，成為蘭學的主流。

當時日本國內陸續出現許多著作，領域遍及內外科醫學、本草學、天文曆學、地理、物理、化學等，內容愈趨專業化，水準不斷提高。同時隨著蘭學的發展與影響，學者間逐漸出現西歐科學的思維方式、自然觀和社會觀，而對封建思想秩序提出批判。但當時俄國力謀南下、英國勢力增強與後來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使得國際局勢日趨緊張，日本對外關係愈益密切。蘭學因而成為受幕府掌控的官府學問，並由於增產興業的學問演變成重視國防軍事的學問。

一八一一年幕府當局設置了「蕃書和解御用」編譯館，集結了一些優秀的蘭學者和翻譯官進行西洋書籍的翻譯，將西

洋地理學、砲術書和百科全書等譯成日文，如《輿地誌》、《海上砲術全書》、《厚生新編》等。一八五五年日荷締結和好條約，一八五八年簽訂通商航海條約。荷蘭國王則於一八五五年贈送一艘蒸汽車艦給日本，幕府乃在長崎創設了海軍講習所，由荷蘭招聘海軍官兵二十二名擔任教官，教授西洋海軍技術；一八五七年聘請荷蘭海軍醫公開講授西洋醫學。隨著幕府末期政治情勢緊迫，幕府和各地藩屬無不努力加強蘭學的研究與教授，應用蘭學不努力加強蘭學的研究與教授，應用蘭學培育出上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門生，振興軍事工業、充實軍備。



1855年，日本在長崎創設了海軍講習所，聘請荷蘭人擔任教官。

蘭語與醫學知識，奠定了今村繁實的荷蘭語基礎，日後得以順利通過稽古通詞考試。尊貝黎則與江戶一些蘭學學者保持親密交往，並將治療梅毒的秘方傳授

給翻譯人員，歸國後發表了《日本植物誌》。

在日蘭交流中影響最大、貢獻最多的是當屬德國醫師席博爾德（Philipp Franz

Siebold, 1796 – 1866）。他獲准在長崎郊外鳴瀧開設診所與私塾，為患者診療同時傳授臨床醫學和西洋學術。除了他的門生以外，曾和他接觸過的衆多幕府醫師和江戶學者在學習研究上也多少受到他的啟發。他晚年則在荷蘭最古老的大學萊登（Leiden）大學繼續從事日本研究，並設置了全球第一個日本學系。一八六二年幕府從學界和政界選拔精英十五人為遣歐使，其中數人即在此大學研習法律與經濟學。而建造於一五八七年的萊登大學附屬植物園也是歐洲最具歷史的植物園，裡面的日本庭園就矗立著席博爾德的雕像，園中種植的日本特有的紫藤、七葉樹、楓樹、銀杏和繡球花，就是他從日本攜回種苗栽培成長至今的。另外位於萊登市的國立民族博物館所收藏的兩萬多件與日本有關的民俗資料中，有一半是幕府與明治初期的物品，大至幕府諸侯的座輜小至植物標本都有，據說其中數千件也是由席博爾德所提供的。而他所撰寫的《日本》、《日本植物誌》、《日本動物誌》，加上坎皮爾的《日本誌》和尊貝黎的《日本植物誌》，長年以來都成為歐洲人士欲研究日本、了解日本人的基礎文獻。

幕府門戶開放後，隨著渡日外國人增多，荷蘭語以外的英語、法語等外語

也開始傳到日本；外交情勢日益複雜，幕府也已無法再只透過蘭學和外國折衝，而必須和各國進行個別直接的交涉，蘭學的

影響力因而逐漸減弱。但自江戶時代至明

治初期，日本在吸取西歐諸國文化上，蘭



1795年1月1日，江戶的蘭學學者元旦祝賀的場面，反映蘭學的盛況。

了重要角色，使日本在文化上起了顯著變化，而能順利進行明治維新，發展成現代化國家。

二度蘭學的呼聲

時光進入二十世紀的七〇到八〇年代初，荷蘭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蕭條，政府財政欠佳、國民賦稅負擔沉重、人事費用不斷增加、失業狀況日趨嚴重，被經濟學者稱為「荷蘭病」。但經過將近二十年的戮力改革，當其他歐盟國家依舊為高達百分之十左右的失業率所苦，而荷蘭卻從百分之十以上降到了百分之二~三，財政赤字更於一九九九年反轉成盈餘，在各種有關國際競爭力的調查中，總是居歐洲各國之冠，世人誇讚是歐盟的模範生。在一般人印象中，今日荷蘭是一個風車、木鞋與鬱金香的國度，有些人也知道安樂死、大麻、賣春在荷蘭都是合法的。然而在日本學者眼中，卻看到了促成今日荷蘭活力的一些模式，呼籲政府再度向荷蘭學習。日本在過往歷史中數次向海外取經，移花接木截長補短，成功地造就自身的成長或轉型。這回日本是否能透過二度「蘭學」，突破現狀起死回生，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淡江大學日文學系專任講師) ■